

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
——**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
(1500—1840)

李伏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 (1500—1840) 李伏
明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5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6辑 陈星主编)
ISBN 7-5034-1619-X/G·0307

I. 制… II. 李…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上海市—1500—1840
②社会发展—研究—上海市—1500—1840 IV. F1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2005)第 015227号

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 (1500—1840)
责任编辑:方正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号 100811

印刷: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10110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243千字

印数:1000册

版次:2005年5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全套定价:300.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总序

张立文

近代以来,西学潮水般地涌进,激烈冲击着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适应于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中国知识精英们纷纷吸纳西学。这种中西学术文化的交往和碰撞,是促使学术文化转型和发展的动力。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向现代转变。

中国学术文化在学习、接纳、引进西学的过程中,按西学的学科分门别类,以现在话语说便是与世界学术文化接轨。接轨意蕴着痛苦的冲突和融合:一是要转变传统学术文化的思维方式、立场观点、价值观念、评价标准,以适应西学的需要;二是要肢解传统学术文化的有机整体,选出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而叙述之,不符合于西学学科名之者的资料则抛弃之;三是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主体的自我发展演化为被动的、受制于人的发展演化;四是要放弃一些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照着西方学科范式和学术规范讲。在中西学术文化的交流中,有得必有失,有收获也必有牺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如何得多失少,收多损少,这便大有讲究。主张学术文化“全盘西化”者,“一边倒”学苏联者,则得少失多;学术文化保守主义者、国粹主义者,则失少得少,两者在得少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① 罗素:《中西文明比较》,胡品清译,《一个自由人的崇拜》,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

在中西学术文化交流中,如何得多失少?应选择融突而和合转生的方式。印度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文化,在汉代传入中国后,便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冲突,展开了“沙门敬不敬王”、“神灭不灭”、“因果有无报应”以及“空有”、“夷夏”、“化胡”等辩论。到唐韩愈主张对佛教文化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①的简单拒斥方法,而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出入佛道。柳氏在回答韩愈指责他为什么不斥佛时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②柳宗元在当时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一是以平等、同情的立场和视角看待三教,不扬此薄彼,或尊彼卑此;二是出入儒、释、道三教,才能深入各家学术思想的堂奥,既悉其本真,又知其长短;三是在出入儒、释、道之中,明三教冲突之所在,才能悉三教融合的关键。在这里冲突也是一种融合的方式,所以不能排斥冲突,而应融合冲突;四是吾所取于佛、道者,与《易》、《论语》合。换言之,柳宗元是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发,以《易》、《论语》为“取”的标准,不是以佛、道为“取”的标准,即取佛、道以合于《易》、《论语》,而不是相反,从而在“统合儒释”中发展中国学术文化。

韩、柳两人对待外来学术文化与本土传统学术文化的立场、态度及其“取”法,对后世宋明学术文化影响巨大。宋初一派以“夷夏”、“费财”之辩拒斥佛教;另一派出入佛道,无论是张载、二程,还是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累年尽究佛、老之说,而后反求诸《六经》,终于在儒、释、道三教融突中和合转生为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学术发展的历史说明,粗暴的批判,取缔的暴力,激烈的拒斥,并不能消除一种思想、学说、理念对于人的思维、心灵的渗透和影响。韩愈主张对佛教采取强制僧侣还俗,焚毁经卷,没收庙产的做法,并没有阻止佛教的继续传播和发展。在唐代,绝大部分第一流知识精英与佛、道有很好的交往,以至相

① 韩愈:《原道》,《韩昌黎集》卷Ⅱ,《国学基本丛书》本。

② 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卷2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3—674页。

信佛、道,出现了一批伟大的宗教家,而没有造就伟大的儒学哲学家。伟大的儒学哲学家应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统合儒、释、道三教之学者,宋明理学家沿着融合儒、释、道三教道路,出入佛老,反诸《四书》,和合转生,而开出理学的新学风、新思维、新理论。

在当今中、西、马学术文化交流互动的情境下,学术界在改革开放以后清算了极左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春天,营造了生动活泼、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提倡说理充分的批评与反批评,鼓励大胆探索,主张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既不要把学术探讨中出现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倾向性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明确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学术研究和讨论松了绑。在这种学术的氛围中,中、西、马学术文化的冲突、融合,而喷发出智慧之光,中华学术文化在吸纳西、马学术文化中,和合转生为新的学术文化;西、马学术文化在中国化过程中,成为中国化的西、马学术文化。中、西、马学术文化融突和合,生生不息。

无论是中华学术文化的和合转生,还是西、马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都应从创新出发,立足于创新,落实于创新,创新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硬道理。我们“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我们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要“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这里所说的“三个解放”,就为中华学术文化的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的“三个创新”,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优越氛围。我们应该有下地狱的精神和盗天火的勇气来实现中华学术的这“三个创新”,建构中华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便是从这“三个创新”契入,回应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冲突和危机。他们各自从教育学、中西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新闻学、语言

学、科学等多视角、多层面探索问题。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接触各种学术文化中的深层问题,提出种种化解之道。既有对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继承和新诠释,又有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吸收和新诠释。在融突“古今中西”学术文化中,尊重知识,尊重人品,尊重人才,尊重创新,提倡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的争鸣和切磋,那末实现“三个创新”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是为序。

2004. 4. 6

于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

《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是一篇很有特点,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对迄今为止的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从史学观念、范式分歧到各方面的具体结论,进行了全面的盘点和检讨。作者借助上海地区作为其实证立论和发挥自己看法的基地,既肯定了许多研究成果,也对许多判断提出了修正或不同的见解,而其旨归则意向更为宏远,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史的研究,必要独立地依据中国的实际,梳理归纳出其自身的脉络和特点,方可称得上不负中国史学创新的使命。作者的理论检讨和史料实证分析,特别是数据统计方面,非常用功和用心,阅读面之广,工作量之大,异于常人。我是过去研究状况中的情景中人,故能对这样一种雄心勃勃的论文架构,需要付出的艰辛和努力,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都有比较充分的同情理解,也表示由衷的钦佩。我想,现在可能是到了全面盘点和检讨这方面研究的整体成绩,寻求新的突破或提高的时候了。李伏明发此先声,表明青年人的敏锐感觉和勇于挑战,希望也就在这新的一代。无疑这一工作刚刚开始,感觉到问题,不等于就能顺利地解决问题;新的见解的提出,也还有一个证实和证伪和过程,不可能很快就會形成共识。总之,一切都必得通过群体性的努力,包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切磋和争鸣,但重要的是必须有人不满足现状,开始起步。

——著名学者,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王家范

对于任何研究来说,理论和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简单地运用来自西方世界的理论能否准确表达中国的历史实际这一理论上的质疑出发,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上海明清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对长期以来人们所运用的“革命史学”和“现代化史学”两大基本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立意新颖,思路与众不同,独具慧眼,在充分把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脚中国本土,选择中国现代化的重地上海,从经济、政治和伦理三个方面来描述和讨论明清时期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并对以往的基本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全文结构严整,层次分明,文字流畅,分析能力强,论证充分,理论水平高,所言颇有独到之处,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突破和创新,是一篇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著名学者、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周生春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理论范式	… (1)
第二节 本书的选题与方法论基础	… (9)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基础、史料问题及基本内容	… (18)
第二章 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地位：以粮棉种植为中心	
——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一	… (25)
第一节 生态和自然环境基础与经济发展	… (26)
第二节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 (34)
第三节 关于农业生产的地位问题	
——以粮食生产和供应为中心的考察	… (41)
第三章 棉纺织业的发展与棉布的市场销售	
——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二	… (53)
第一节 棉纺织业生产技术和进步	… (53)
第二节 明清时期松江府棉布产量和销售量新探	… (57)
第三节 明清松江府棉布的市场销售问题	… (65)
第四章 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及其他	
——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三	… (75)
第一节 盐业和渔业生产的发展	… (76)
第二节 运输业和市镇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繁荣	… (79)

第三节 商业政策与所谓的闭关自守问题	(88)
第五章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	(105)
第一节 关于官田与重赋问题的再探讨	(107)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田赋逋欠问题	(114)
第三节 赋役制度改革及其社会经济后果	(125)
第六章 地主、商人与明清上海社会	
——明清上海社会结构探讨之一	(133)
第一节 缙绅地主的特权及其社会影响	(134)
第二节 明清上海地区的商人与商帮	(146)
第三节 缙绅地主和商人的消费行为述论	(155)
第四节 上海商人的“买办”性格成因初探	(162)
第七章 农民与明清上海社会	
——明清上海社会结构探讨之二	(170)
第一节 农民与明清上海社会结构	(170)
第二节 土地关系问题	
——以永佃权和“一田二主”为中心的考察	(177)
第三节 农家生计述论	(183)
第四节 关于小农经济的几点理论辩证	(192)
第八章 生计观念：明清上海社会的经济伦理基础	(201)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生计观念	(202)
第二节 生计观念与明清上海社会各阶层的经济行为分析	(216)
第三节 生计观念与明清上海地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问题	(224)

第九章 余论	(233)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243)
后记	(261)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理论范式^①

任何学术研究的展开都是基于人们提出了一些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然后从学术的角度去回答它、解决它,并用一整套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学术语言表达出来。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即人们首先提出了一些被认为是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中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然后试图通过仔细地搜集证据、准确地解读史料文本来予以回答,这便构成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内容。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论述的是网络而不是网络所包含的内容,这就是说,一切的研究文本,与其说是反映和表达了客观事实的真相,还不如说是以逻辑的形式通过语言文本来试图重构所谓的客观事实真相,而通过语言文本所重构

^① 在现代科学哲学史上,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首先提出了“科学范式”这一概念,“范式”(Paradigm)一词来自希腊文,表示词形变化的规则。托马斯·库恩借以用来说明他从科学史研究中获得关于科学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的模式。科学“范式”(Paradigm)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定时期内科学共同体“看问题的方式”,包括共有的方法论、信仰和价值标准;二是科学共同体一致接受的专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包括可以进行逻辑和数学演算的符号概括系统。托马斯·库恩是从科学史研究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如今人们认为也适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但就其基本的内涵和外延尚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本文所使用的“范式”这一概念正是来自托马斯·库恩,其内涵即包括以上两个方面。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1980年;《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1年。

的所谓的“客观事实真相”与历史经验中实际存在的客观事实真相并非一致甚至不可能一致。这一点,得到了萨义德的强有力的支持。他强调:

“真正的问题却在于,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或者,是否任何以及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其次受表述者所属的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相信如此),那么,我们必须准备接受下面这一事实:一种表述本质上(*eo ipso*)乃牵连、编织、嵌陷于大量其他事物之中的,惟独不与‘真理’相联——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这一事实迫使我们认识到表述(或错误的表述,二者之间的差异至多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里面包含有一片公共的游戏场(*field of play*),决定这一游戏场的并不只是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对象,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①

这是一种所谓后现代的极端相对主义观点,按照这一逻辑,历史研究即无所谓仔细地搜集证据、准确地解读文本了,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实事求是”了。一切的表述仅仅反映着历史学家的文化趋向,都是时代流行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实质上都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理,其差异充其量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包括史学理论,都只是为某种流行话语体系提供支持而已,与真理无涉。这对于长期以来兢兢业业、试图探寻历史真相的史学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无论如何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然而,萨义德的说法并非一派胡言,毫无说服力。如果我们认真地反思一下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学术研究史,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萨义德的说法并非完全是准确的,但也具有相当说服力和警醒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无论是所提出的基本问题,还是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理论(这两者实际上是密不

^①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第349页,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

可分的)几乎都源于西方。这是与特定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正如克罗奇所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之所以去认真研究和探讨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与其说是为了探寻历史的真相,还不如说是为了理解现实,展望未来。问题在于,就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言,人们所试图理解的现实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后形成的现实,而所谓的未来,几乎别无选择地就是象西方世界一样实现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于是,人们使用来自西方文化的概念工具,并以西方为赶超对象来思考研究如下一些问题:曾经非常强盛的“天朝大国”为什么会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国又应当怎样赶超西方列强而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自己是否具有实现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这便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问题。由此便形成了用来自西方文化的话语系统来表达明清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的这一现象。至于这种表达是否能够准确地理解和说明这些问题,显然并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与其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换言之,当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严酷境地,当中国面临着必须赶超西方列强而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严肃使命时,现实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无可避免地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进程。

对于中国大陆的史家而言,正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至少其理论表述是这样的)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才使得中国摆脱了长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并开始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这一事实本身即赋予了中国革命及其指导理论(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可置疑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由此形成了以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递进说为基础的“革命史学”范式。人们一方面以这一史学范式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以此说明近代中国陷入落后挨打境地的原因。在这一范式中,诸如“阶级斗争”、“地主制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等成为主导性概念,并以此来说明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显而易见,在

“革命史学”范式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具有突出影响。可以说,革命史学正是时代流行革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展开,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时代的主题,由此,“革命史学”迅速向“现代化史学”范式转变。^①正如人们强调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那样,现在人们也相信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样是“有中国特色的”,于是,人们纷纷质疑或默默放弃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递进说,指出这是一个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假定。与此同时,包括以研究资本主义萌芽著称的吴承明先生自己在内,越来越多的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模式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有人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异化为一种“情结”。^②与此同时,从前人们所重视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问题被边缘化了。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成为人们研究的主题。人们一方面继续探讨中国陷入落后挨打境地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为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寻找历史文化基础——中国显然存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的这一事实本身即证明了这一点。与过去的“革命史学范式”一样,新的“现代化史学范式”同样使用着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话语系统来表述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而且往往同样也以西方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来观照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变迁。只是从前人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主要来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现在则有更多的选择,几乎所有的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变迁的理论都可以为我所用——其中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占有重要地位。比如说,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发展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

^① 关于这一转向,Alif dirlık最早指出了这一点,中国学者李文海也有精当的评论,见李文海《对中国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几点看法》,《清史研究》1997年第一期,北京。

^② 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读书》1996年第八期,北京。

知识的函数,于是,人们纷纷探讨的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配置状况。既然明清时期中国没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那么,肯定是这些资源的配置出了问题。李伯重先生就认为,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之所以没有实现突破,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主要是由于就缺少煤铁等原材料和燃料,因而江南地区的早期工业化只能向超轻型方向发展,不能实现机器大工业革命,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用说,如果有了丰富的煤铁等原材料和燃料煤铁等原材料和燃料供应,那就应当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总之,从前人们要论证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所阐述的所谓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现在人们则要论证:从西方世界兴起的的历史经验来看,明清时期中国的确已经具备了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只是某些偶然的或必然的因素,中国才没有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当然,这些因素是能够克服的,而且事实证明,实际上很多现在正在克服或已经克服了。

海外学者理所当然地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场上,运用自己的话语系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和表达。在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之前,海外学者主要根据来华传教士的各种报告、著述和书简对中国进行“想象式建构”,用萨义德的话来说,中国作为想象的异邦被“东方主义”化了。根据他们的想象,中国或被赞美,或被贬斥。一切都与西方世界自身的现实境遇相关。十九世纪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拓展,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普世逻辑开始支配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识。包括马克思在内,西方的学者和思想家大多把中国描述为一个愚昧野蛮、专制落后、停滞不前的国家,但西方的冲击将能够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而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也就是说,中国根本不可能凭自身的力量走向资本主义,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韦伯在他的名著《儒教与道教》中,中国根本就不存在象西方世界那样的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而儒家的经济伦理使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中不可能有构成现代资本主义重要精神基础的形式

化理性。^①所有这些思想,直接构成了后来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模式的先驱和基础。在费正清那里,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法律宗教、思想文化都使中国无法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西方力量的冲击对中国停滞的传统产生了决定性的改造作用,引发了不断的社会革命,使中国逐步走上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显然,中国只是西方世界现代化的波及对象。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来说,人们同样发现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不同,他们认定中国的确不可能凭自身的力量走向资本主义,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中国要走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西方力量的冲击(包括来自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冲击)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帕金斯的“停滞论”、伊懋可的“陷阱论”以及黄宗智的“过密化论”等等。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明清时期,中国之所以没有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因为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技术和知识的配置严重失衡。

随着现代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发现,象费正清那样把中国视为西方世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波及对象是不恰当的,中国确乎有某种自生自发的转化和创新能力。换言之,没有理由把中国内部的变化全部归结于“西方冲击”,必须从中国人自身的立场出发理解中国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也就是说,必须“在中国发现历史”。正如柯文所强调指出的那样,选择历史事实的意义取决于我们所提出问题的方式,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关注时代演变的主观角度。^②当代中国的崛起使人们确信,尽管近代中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但中国社会中的确存在实现社会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基础,至于中国之所以没有自己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其说是必然的,还不如说是偶然的,或者说,各个

① 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3年。

②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